

保安接力资助6名贫困生3年

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多元,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保安”,就是这样一个团体,三年来却坚持支助贫困学生。人员不断地流动,帮助贫困生的行动却从未间断过。他们说,爱心接力棒会永远传递下去!

他们就是辽宁省高速公路实业发展总公司昌图服务区保安大队的成员们。受资助的学生在信中说,“认识你们是最幸福的事。”

6名保安资助6名学生三年多

又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昌图县老城镇南桥小学大队辅导员王薇知道,有几位重要的客人就要来了。9月3日上午11时,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担心影响学生们上课。保安大队五名成员和昌图服务区经理赵森林一起下了车。“保安大队本应该有六个人,但不久前刚有一个人不干了。赵经理是来填补这个空缺的。”保安大队大队长江洪波说。

“江叔叔、张叔叔……”阔别了一个学期后,孩子们仿佛遇到了亲人般跑到资助他们各自的叔叔身边。问了同学学习怎样、生活情况,叔叔们把装在信封里的100元钱交给孩子们,还把事先准备好的文具交给大队辅导员王薇,再分发给孩子们。见面短短10分钟,他们就离开了。

三年来,他们早已达成共识:不要占用他们的学习时间。

时间倒转至2006年初。从部队退伍的江洪波来到昌图服务区保安大队任大队长。一天,江洪波看到许多贫困儿童因为几百元而辍学,产生了捐助贫困生的想法。他就私下和保安们商量,愿不愿意捐点钱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

提议得到了赞同后,江洪波开始和当地民政部门取得联系,选择了昌图县老城镇南桥小学为捐助对象。因为保安大队有六个人,他们决定,从学校里找出六名贫困学生进行捐助。

如果当时只是一时的触动而产生的想法,那么后来就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从2006年第一次捐款后,这个捐助行为就没再停止过。

“收入再少,也比那些孩子强”

准确地说,650元是2009年的月工资。三年前,保安大队的平均月工资只有500元左右。来昌图服务区当保安的不是本地农民就是退伍军人。

“有这样的想法时,我刚结婚不久,现在孩子都三岁了”,江洪波憨憨地笑着告诉记者,和妻子程小光沟通后,妻子也很赞同。这是最令江洪波欣慰的事情,因为所有结婚的保安的家属没有一人在这方面拖过丈夫的后腿。

张雷可以被称为一名“老保安”了,他是在2002年来到这里工作的。2006年资助贫困生开始,他就成了第一批成员。出身农民的他利用农闲时节出来打工赚点钱,于是来到昌图服务区保安大队当了保安。“刚当保安的时候,月工资就500多块钱。”张雷说。

“别看就赚500多块钱,怎么都比这些孩子强。”张雷说。2006年,张雷和刚刚上小学的宁宁结成帮扶对子。张雷说,宁宁没满月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不久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多年未归,她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全家靠几亩地的微薄收入生活。和宁宁结成对子没过多久,孩子就给张雷打电话,想让张叔叔到她家去一趟。

骑摩托车10分钟来到宁宁家。所看见的是已经为数不多的北京平(一种平房,是当地的一种称呼)。砖都裂缝了,想打开窗户需要用木棍支起来。在这间小屋里,宁宁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看到眼前的一切,张雷作了一个决定——再难也要帮这个孩子。

2006年底,张雷收到一封

用田字格写的信:“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是我认识张叔叔,是我最幸福的事……”信上没有更多的感谢。但是,看了田字格上工工整整写出来的这几句话,一个大小伙子哭了。旁边与张雷一起看信的同事们也都泛起了泪花。

时至今日,张雷有了自己的家,孩子刚刚20个月。除了种地,张雷的这650元的月工资几乎占据了全部家庭收入。但对宁宁的资助却始终没有停止。“我们是每月交20块钱,这钱怎么都能省出来。就像队长说的,一个月少抽几盒烟,钱就出来了。”张雷说。

“别看就赚500多块钱,怎么都比这些孩子强。”张雷说。2006年,张雷和刚刚上小学的宁宁结成帮扶对子。张雷说,宁宁没满月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不久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多年未归,她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全家靠几亩地的微薄收入生活。和宁宁结成对子没过多久,孩子就给张雷打电话,想让张叔叔到她家去一趟。

骑摩托车10分钟来到宁宁家。所看见的是已经为数不多的北京平(一种平房,是当地的一种称呼)。砖都裂缝了,想打开窗户需要用木棍支起来。在这间小屋里,宁宁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看到眼前的一切,张雷作了一个决定——再难也要帮这个孩子。

对于吴铎捐助行为,吴铎的老伴给予的是最大的支持。

虽然吴铎的家庭也不富裕,不过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家,没有了家庭负担,吴铎表示:只要在这一天,就会一直捐下去。

“虽然都是临时工,但没有一人打退堂鼓。”吴铎这样说。现在,每个月开完工资,同事们就会主动交出20块钱。保安人数不足时,队长江洪波就会自掏腰包。

后来,吴铎发现一个很好的赚钱办法——捡瓶子。在服务区,很多人离开后会留下饮料瓶子,这里的保安夜里还要充当保洁,他们就把瓶子捡起来卖钱,做备用资金。“以前是三块钱一斤,现在便宜了很多,不管多少,都作为备用基金存起来。”吴铎说。钱不够了就从这里补,或者给学生们买点文具,到了各种节日,还给这些学生送些米面等。

在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性。有的保安因为家庭贫困找到别的工作,但只要在这工作,他们都会严格遵守这个约定,直到离开的那天。而且,每位新来保安了解了这个惯例后,也会自觉接上这个班。新来的保安刘润生说:“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在这干一天,我也能坚持一天。”

6个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三名学生考入初中,他们就从学校再选出贫困学生资助。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承诺:不管保安人

数怎么变化,六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贫困学生除了能继续坚持学业,他们的学习劲头也更足了。学校大队辅导员王薇说,接受资助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单亲家庭,长期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学习虽然非常优秀,但是他们都十分内向,特别不喜欢和外人交流。东东从小就沒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和奶奶一起生活。遇到不高兴的事就自己偷偷哭,很少和别的同学一起玩。现在,他逢人就讲他的江叔叔,甚至多过讲他的家人。性格也变得比以前开朗了。有什么心事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江叔叔。

江洪波说,现实情况决定了资助的对象只能是老城镇南桥小学。因为来这里当保安的,家庭情况也都不富裕。虽然资助的钱并不多,但是少抽一盒烟,少喝一瓶酒,积累起来就能帮一个可能会辍学的孩子。而且,看见孩子们像对亲人那样对待你,那样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江洪波说,如今,资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小学教育是昌图服务区保安大队每名保安的共同目标。对于爱心能否传递下去,江洪波和他的同事们一点都不担心:“即使我们都走了,我们的爱心接力棒一定会继续传递下去,因为这是我们服务站的规矩,也是我们心中的承诺!”

据《辽沈晚报》

李双良:搬掉废渣山的“当代愚公”

上世纪50年代,他是闻名全国的“工业炉渣爆破能手”

80年代,不花国家一分钱,矢志不渝搬掉沉睡近50年的渣山

如今,教育关心下一代……李双良用“双良”精神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流汗,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眼前的李双良和蔼可亲

8月5日,窗外小雨淅沥,太钢昔日旧渣场。亭台楼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旧渣场已变成花园一般。

在这里,86岁高龄的李双良有一间办公室,除了耳朵有些背,老人家的身体还算硬朗。他每天定点上下班,接待来访和咨询,闲暇就下下棋、看看报纸。他说:“每天来这地方走一圈儿,心里就觉得踏实,既活动身体,也活动脑子,很好!”

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李双良很知足地告诉记者:“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厂里奖励我房子,还配了专车,真是享福啊!”

老人很认真地带着记者在花园般的旧渣场中参观。驻足假山、穿过翠绿的树林、看着挂果的果树,观看李双良纪念馆里一幅幅珍贵的图片……记者不住地感叹——“您真了不起,真不容易啊!”闻听,李双良老人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李双良。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我李双良纵然浑身上下都是铁,又能打成几个钉!”

上世纪50年代,就是爆破大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国家

建设急需钢材,而当时的炼铁炼钢设备陈旧落后,还经常发生事故,影响产量。为了节省修炉时间,1952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太钢成立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高温沉渣爆破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当炉内结瘤石,在高温条件下,工人们钻到炉内放置炸药,实施爆破。

谁都知道这活又苦又累又危险,一起来学习的几名工人先后离开了,坚持下来的只有李双良一个人。他还在多次实践中,总结出:“胆大心细讲科学”的七字经验,在全国冶金行业推广。后来,上钢、武钢、重庆钢铁厂等都请李双良去实施爆破,大获成功。李双良也因此获得了“钢铁战线爆破大王”的美誉。

年届六旬,立军令状要治渣山

太原钢铁公司1934年建厂,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渣场是钢铁生产企业天天倒废渣的地方。近50年的不断沉积,废渣越堆越多,越堆越高。到1983年,太钢渣场已经形成一座占地数平方公里的“大渣山”,这座渣山最高处有7层楼那么高。每当倒渣时,灰尘滚滚、烈焰升腾,不仅威胁着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正常生活,也成为太原的一大环境污染源。

1983年,李双良年满60岁,刚刚从工段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本该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但他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治渣山,“如果不把渣山搬倒,我死不瞑目!”为此,他立下军令状:国家不用给一分钱,7年,保证搬走这座渣山!

当年,李双良就开始利用休息日带着儿子一起去丈量渣山,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不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勘察,老英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初步计算出整个渣山大约有

1840万吨废渣可开采,预计有36万吨废钢可回收,按当时市场价格200元/吨的价值计算的话,可创造7200万元的价值,他说:“这就足够治理渣山的费用了。”

当这个消息传开后,成了钢城议论的话题,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说“想发财了吧”?有的人说“还不是为了出风头啊”!老朋友们劝他:“都是退休的人了,冒这个险干嘛?”然而,老英雄只是笑笑。

省钱干活,自制手携式磁选棒

1983年3月,李双良被太钢公司确定为治理渣山的负责人,同时从加工厂抽调了近百人,配备了13台大型设备,组建了渣场工段,并成立了党支部。一场治理渣山的大战,在李双良的带领下揭幕了。

1983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双良领着600多号人,数百辆小平车、拖拉机和汽车,浩浩荡荡开上钢城渣山。从这一天起,太钢那近50年来天天“上升”的渣山开始“下降了”。第一个月下来,渣场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运走废渣8万多吨,回收废钢铁近4000吨,总收入47万元,盈利11万元!

废渣是倒掉了,可里面藏着的废钢铁等很多好东西也一同倒掉了。每倒掉一汽车废渣,也等于倒掉几十、上百元钱。后来,李双良到北京钢渣水泥厂参观,看到了那里的一种设备——磁选机。听人家介绍,筛选中小块废钢铁的效率很高,可再一打听一台磁选机得要十几万元,节约惯了的李双良,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斟酌再三,他离京时买了几个大磁鼓,回到工段后,就和职工凭着参观的印象“照葫芦画瓢”,没有备件自己制作,没有材料找废旧的代替,

就这样左鼓捣右摆弄,最后竟然装成4台磁选机,投入使用后效果“还不错”。于是,很快从准备倒掉的废钢渣中,又回收了小废钢铁6000多吨,增收收入90多万元。

磁选机的“研发”,激发了李双良创新的热情,随后又搞出多项革新。手携式磁选棒,职工们拿上往废渣里一插,就把粉末状铁屑都吸上来了;砸渣机,把一些大渣块砸碎,将渣子和废钢铁分离;小化铁炉,把不能直接送进炼钢炉的粉粒状废铁冶炼、铸造出铁条……李双良回忆说:“这些革新就是一个目的,节约!”

1989年,不锈钢原料紧缺,特别是贵重金属镍的市场价格上涨到13.5万元/吨,而不锈钢又是太钢的主导产品,维持生产的难度可想而知。李双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发动职工从废钢中拣选回收了不锈钢渣8179吨,价值达1514万元。

钢和铁选尽了,其他废旧物资也不能扔掉。治理渣山期间,李双良和职工们共回收耐火砖3878吨,镁砖12332吨,电极805吨,加热炉渣9196吨,再加上一些可以利用的材料,总共回收多种附属品价值达1018.81万元。

请教老师,让废钢渣变废为宝

如何让废钢渣变废为宝?一直是李双良老人思索的问题。为此,李双良找到了两位从事建筑材料研究的老教授,诚恳地说:“我是太钢的,现在正在治理渣山,总觉得这废渣应该是些有用的东西,但我不知有什么用,怎么用,特地来请教!”说着,他把随身带的几块废渣样品递给教授。老教授被李双良的诚恳打动,认真地向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好东西啊,高炉炉渣,能做矿

棉制品的原料,转炉渣和平炉渣都能当水泥原料,生产出钢渣水泥。”

回厂后,他立即组织职工搞起了综合利用,安装了破碎机,将高炉渣破碎后经过加工筛选,用来代替石子铺路,仅修成一条19000平方米的柏油路,就节约石子费近20万元;用钢渣制成四方和六方水泥砖200多万块,为渣场的新建工程和公司内的一些公共场所提供了大量的建材;加工破碎了35万吨高炉渣,为省内7个矿棉厂生产矿棉制品提供了原料;为防洪坝、公路、楼房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渣子,以代替回填土,既提高了质量,又为施工单位节省了大量费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加上废渣制作的水泥砖,最后一算账,修建规模宏大的防尘护坡,不仅没有花太钢公司一分钱,反而赚了14万元。护坡竣工后,李双良又组织职工在上面修建了花坛、假山、鱼池、凉亭和长廊,并种花植树7万多株。护坡的修建不仅挡住了渣尘,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还美化了环境。

治理渣山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挖排废渣、废钢回收、废物利用等一系列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从1983年至2000年,太钢渣场已挖排废渣2951万吨,回收废钢铁129万吨,创造经济效益3.3亿元,总盈利1.3亿元。在实践“愚公移山”的宏伟理想中,李双良不仅总结出“以渣养渣、以渣治渣、综合治理、变废为宝”的治理废渣的成功思路和经验,而且探索出一条通向环保经济、绿色经济的康庄大道。”

如今,治渣后腾出的约2千亩土地,除建设了太钢消防队大院,太钢加工厂厂区和成片的居民宿舍楼外,还建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而太钢渣场也被命名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环境教育基地”,从1990年至今,累计已接待国际、国内参观者50余万人。

成功搬走渣山后,1993年,70岁的李双良,成为太钢关工委副主任。多年来他兼任着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名誉校长、校外辅导员,累计为儿童青少年作报告300多场,受教育者达20余万人。

据《山西晚报》